

INFLUENCES OF FARMERS' INCOME QUALITY ON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农民收入质量对 消费和投资的影响

任 勘 孔 荣 著

INFLUENCES OF FARMERS'
INCOME QUALITY ON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中国“三农”问题前沿丛书

农民收入质量对 消费和投资的影响

INFLUENCES OF FARMERS
INCOME QUALITY ON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任 劲 孔 荣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民收入质量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 / 任勘, 孔荣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11

(中国“三农”问题前沿丛书)

ISBN 978 - 7 - 5201 - 1479 - 0

I. ①农… II. ①任… ②孔… III. ①农民收入 - 研究 - 中国 IV. ①F3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0137 号

中国“三农”问题前沿丛书 农民收入质量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

著 者 / 任 勘 孔 荣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 目 统 筹 / 任 晓 霞

责 任 编 辑 / 任 晓 霞 姜 宇 航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社会学编辑部 (010) 59367159

地 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 编：100029

网 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9 字 数：264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479 - 0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导 论	001
一 研究背景	001
二 研究目的和意义	006
三 文献综述及评价	009
四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037
五 创新之处	044
第二章 研究理论基础	046
一 相关概念界定	046
二 相关理论回顾	052
三 理论框架构建	067
四 本章小结	080
第三章 农民收入质量的微观研究基础	082
一 农民工收入质量评估	082
二 农户收入对信贷的影响分析	097
三 农户收入质量体系的微观验证研究	114
第四章 农民收入质量体系构建与验证	130
一 收入质量研究从微观到宏观的变迁	130

二 农民收入质量体系构建	134
三 农民收入质量体系验证	141
四 本章小结	149
第五章 农民收入质量测算与评价	150
一 农民收入质量测算	150
二 农民收入质量评价	163
三 本章小结	170
第六章 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173
一 农民收入质量影响农民消费的理论分析	174
二 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178
三 本章小结	205
第七章 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投资的影响分析	208
一 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投资影响的理论分析	210
二 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215
三 农民收入质量通过信贷对农民投资的影响分析	228
四 本章小结	236
第八章 农民收入质量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研究	239
一 农民收入质量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的理论分析	239
二 我国农民收入质量与经济增长序列的选取和 描述	244
三 农民收入质量与经济增长关联性实证研究	248
四 本章小结	258
第九章 基于促进消费与投资的农民收入质量提升 政策分析	259
一 农民增收政策措施简述	259

二 基于促进消费与投资的农民收入质量提升 政策建议	262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272
一 研究结论	272
二 研究展望	276
参考文献	278

第一章 ◀ 导 论

“三农”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严重问题，既是约束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同时也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农民增收，但是如今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这不但影响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阻碍了农村经济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均表明，收入是影响农民参与经济活动的关键原因，影响渠道极多。学术界已有理论认为，农民的收入水平已经不再适合使用单纯的收入数量进行衡量。收入质量概念的提出，为评价收入水平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以收入质量理念为思路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其将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基于以上分析，本章主要阐述本书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国内和国外文献综述与评价以及本书的创新之处。

一 研究背景

（一）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党中央始终对“三农”问题保持关注，从2004年至2016年，中共中央历年首份文件均以“三农”为主题，这一传统已延续了13年。2015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核心思想为，“三农”问

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期间面临的重要问题，农业现代化成为新“四化”的重要组成，并且进一步明确和部署了下一步农村深化改革的主要工作。2016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核心思想为，对待“三农”问题在任何时刻都不能放松，在进行有关“三农”问题的工作时要保持高度责任心，党员干部必须提高对“三农”问题的认知和重视程度，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由此可见，“三农”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紧要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而且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国民素质的提高。“三农”问题虽然涉及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个方面，但由于农民在农业增长与农村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主观能动性，欲解决“三农”问题，首先需要解决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便是收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富裕农民，需要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党中央、国务院亦从多角度全方位出台促进农民增收的指导意见。综上所述，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我国农民收入数量虽然增长迅速，然而仍然处于中低收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虽有所下降，但是绝对差距依然很大。自2010年起，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年增长率均突破10%。2013年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达到8896元，年增长率为12.37%，收入数量与增长率均创历史新高。然而，相对于城镇居民收入，该收入数量依然极低。由于中央政策的调整，城乡收入差距自2010年达到3.23:1的历史极值之后逐步下降，但下降幅度十分有限。2014年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在2.97:1。农民的收入结构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201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已超越经营性收入，比例达到了约42.66%。转移性收入比例也上升至约17.69%，也成为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农民收入水平低是农村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

在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迅速的同时，经济增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2007年GDP增幅高达14.2%以来，受我国宏观政策及

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2008年至2011年经济增长基本保持在9%左右，2012年和2013年增长率均为7.7%，2014年为7.3%，2015年降至6.9%。我国经济增长的降速，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的结果，是为了我国经济更加健康稳定增长。农村经济的增长，是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构成，但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的现状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以及国民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

首先，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率低限制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2014年我国拥有6.19亿农村居民，占总人口的45.23%，蕴含巨大的消费潜力。然而，农民收入水平低下，严重影响了对其消费潜力的挖掘及农村消费市场的活力。2014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用品服务消费、教育文化娱乐消费、食品消费以及交通通信消费仅为同期城镇居民各类消费的40%左右。农村居民服装消费甚至仅有城镇居民的30%左右。农村居民仅在医疗保健消费方面与城镇居民接近，这也仅得益于“新农合”等政策的推广。通过数据可知，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下，这造成了城乡居民消费严重失衡。这种失衡甚至可能影响我国未来的经济走势。其次，农民收入水平低限制了农民投资和农业再生产。该限制体现在农民在家庭经营费用和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不足两个方面。2004年至2014年，我国农民家庭经营费用人均支出仅增加了1694.5元，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人均支出仅增加了161.4元。资本在我国农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然而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导致资本形成受阻，不利于农业技术的推广和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务农收益，低收益引发农民务农的低积极性，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为了提高农民投资尤其是农业方向投资，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是必要条件。最后，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率低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进而影响农村经济增长。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间、区域间以及农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该情况不但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且影响了城乡统筹发展及

农村经济增长。因此，增加农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增长。

(三) 收入质量是衡量收入水平的合理体系

农民的收入水平经常由收入数量直接进行衡量。传统观念认为，收入数量越高，收入水平越高。在农业经济管理方面的已有研究中，有关“三农”问题中农民的收入水平变化也经常以简单的收入数量变化作为衡量标准。然而，随着我国经济、政策、收入结构、外部环境等的变化，农民收入水平已不再适合仅用收入数量衡量。农民的收入水平，不仅仅是一项关系到民生的数据，更是一个重要的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例如，农民收入结构不合理，面临收入减少的风险较大，该农民的部分收入将作为预防性储蓄，限制了农村消费市场和再生产。同理，收入成长性较差、成本较高的农民，即使拥有相同的收入数量，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低。经过上述分析可知，在收入数量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收入结构更合理、收入成长性更高、获得相同收入所消耗成本更低的农民，其真实的收入水平越高。因此，农民收入水平已不再适合只用收入数量衡量，亟须寻找一种新的评价体系和方法对其进行衡量。

孔荣、王欣（2013）认为，农民工的收入不仅有量的规定性，也应有质的规定性。两位学者以充足性、稳定性、结构性、成本性、知识性五个维度为视角，考察了农民工的收入质量内涵，分析结果证明，农民工收入质量水平亟待提高。在另一篇文章中，王欣、孔荣（2013）提出，已有关于农民工收入差异的研究存在不足之处。农民工收入的数量对比仅是研究该问题的一个角度，其收入结构的差异，获取收入过程中所运用的知识和消耗的成本差异，定期定量获得收入的差异同样是农民工收入的区别和代表性元素。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收入质量的概念。此类研究打破了传统研究中从工资数量和工资差异角度研究农民工收入问题的局限性。收入质量概念的提出拓展了收入的研究领域，为学

者研究收入提供了新方向，收入的绝对数量已不再是唯一关注点。通过借鉴收入质量的核心思想，笔者认为，在研究宏观视角下农民收入对消费及投资影响的过程中，农民收入的数量、增长情况、收入来源比例、消耗成本和知识含量均应纳入同一体系进行系统研究。

根据上文的分析，农民收入数量不再适合衡量收入水平，农民收入数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趋势也体现出不同步的现象。笔者认为，应以收入质量思想为核心构建衡量收入水平的新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综合考察和测算收入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成本性和知识性的总体进步。为了与传统“收入增长”概念进行区分，本书将依托收入质量概念的农民收入总体进步定义为“农民收入质量”，将衡量收入质量的指标理论体系定义为“农民收入质量体系”，将衡量农民收入质量的具体数值定义为“农民收入质量指数”。

（四）收入质量与农民贷款行为紧密相关

金融深化与发展对改变落后地区面貌的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涉农贷款业务一经开设，便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几十年来，政府不断改革农村金融体制、调整农村金融政策，对农村金融的发展做出重大部署，努力寻找农村金融与农村发展、农民增收之间的有效契合点。特别是2003年以来，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均要求以“三农”问题为根本出发点，加快发展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但至今我国涉农金融机构在制度、结构和功能等方面依然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农村金融市场对农户的资金扶持力度和扶持效果一直饱受争议，正规贷款覆盖率在地区间分布不平衡、贷款发放“目标偏移”现象严重、农民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等问题仍客观存在。政府通过金融机构（我国主要是通过农信社）发放贷款补贴来直接干预和影响农村金融秩序，虽然投入很大，但收效甚微，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滞

后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很多农民仍然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农民长期面临生产、生活信贷抑制，导致技术更新步伐减缓、生产效率持续降低、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等负面效应。因为贷款的偿还来源主要为收入，所以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农民贷款行为与其收入数量关联性极大。但邓锴（2014）指出，农民贷款行为的影响根源是农民的收入质量。在贷款过程中农民的行为不仅受到收入数量的影响，亦受到收入结构性、稳定性、成本性和知识性的影响，即收入质量与农民贷款行为紧密相关。

（五）本研究的选题基础和方向

本研究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基于农户收入质量的正规信贷约束模拟检验及政策改进研究”的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为本选题奠定了研究基础和方向，并给予了本研究支持和资助。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研究以收入质量理念为基础构建农民收入质量体系，测算农民收入质量指数，探究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及投资的影响。秉承理论与实践、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学术宗旨，本研究主要使用宏观统计资料，参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二阶段验证性因子分析、熵值法、正态云模型、平稳性与协整分析、VAR 模型、面板数据线性回归模型、门槛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数理方法，评估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及其变动趋势，在准确合理评估的基础之上剖析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消费及投资的影响，分别挖掘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消费及投资之间的影响途径及程度，为我国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健康稳定增长提供参考。

二 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如上文所言，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提高农民收入，农

民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着农民的消费和再生产等，从而对农村经济产生影响。然而，近年来我国农民消费和投资增长率均在逐步放缓，而农民收入数量依然保持高速增长，这预示农民的收入水平已不再适合单纯使用农民的收入数量进行衡量。这说明，应以收入质量理念为依托，建立农民收入质量体系。相比于收入数量的增长，收入质量应是影响农民经济活动的更加有效合理的指标。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在于。

(1) 提出宏观视角下的农民收入质量概念以及构建农民收入质量体系。以收入质量核心思想为基础，借鉴微观视角中对收入质量的研究，分析微观与宏观视角下收入质量研究的异同，进而提出宏观视角下农民收入质量的概念。根据农民收入质量中维度的特点，选取适当指标，构建并验证农民收入质量体系。

(2) 测算农民收入质量指数。以宏观统计数据为基础，参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调研数据，运用熵值法等数理方法对农民收入质量体系进行量化，测算较为合理的农民收入质量指数。通过使用该指数，运用正态云模型等评价方法，评价我国各地区农民收入质量的优劣及差异，发现各地区农民收入质量的分布规律及差异原因。

(3) 探究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在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的基础上，运用数理方法剖析农民收入质量与消费的关系，农民收入质量体系中各维度的影响程度，以及考察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消费的门槛效应、滞后效应和贡献度。

(4) 探究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投资的影响。在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的基础上，运用数理方法剖析农民收入质量与投资的关系，农民收入质量体系中各维度的影响程度，以及农民收入质量对投资的门槛效应。验证信贷配给对农民收入质量影响投资的中介效应，并引入信贷变量，考察农民收入质量、信贷和投资之间的路径影响。

(5)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简要考察农民收入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主要从消费和投资角度为学者和政府部门提供客观可

信的数据以及政策制定的事实依据，并根据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首先，衡量收入水平在学术界一直缺乏一个合理的综合体系，尤其现在我国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本研究以微观的收入质量理念为依托，建立宏观视角下农民收入质量体系，可以改变公众对收入只限于数量的传统认知，更加重视除却收入数量之外的维度。其次，收入质量的现有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以往研究虽然提出了收入质量有高有低，部分研究还初步构建了微观视角下收入质量的评价体系，但是缺乏收入质量的量化和综合评价；收入质量应为客观评价收入的概念，收入数量的变化体现的是量变，收入质量的变化体现的是质变，使用自我感知的满意度进行评价过于主观；现有研究对收入质量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多数研究将衡量收入质量五个维度的所有指标全部作为自变量置入回归方程观察是否显著，没有凸显收入质量是一个单独概念的特点。最后，收入问题和消费、投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消费及投资问题的研究始终是国内外学者感兴趣的热门话题，是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收入分配理论、消费理论、投资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本研究在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农民的提升收入质量的问题，并在消费理论、投资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对农民收入质量对我国农民消费及投资的影响展开分析。

2. 现实意义

对农民收入质量及其影响消费及投资进行研究，从我国当前的现实出发存在如下四个方面的意义。首先，韩长赋（1999）、陈锡文（2001）和林毅夫（2003a）等学者均认为，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掌握和明晰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及各维度的现状，了解当下农民收入水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

键。其次，农民收入质量指数测算依托于农民收入质量体系构建，通过横向比对，评判各地区农民收入质量的优劣与差异，通过区域间农民收入质量差异的表象分析其深层原因，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再次，近年来农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率低下，消费和投资能力弱，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依旧没有完全复苏，我国继续依靠投资和出口规模扩大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带来极高的风险，因此一方面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需要通过适当扩大内需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增长。农业经济管理学普遍认为，农民实际拥有极大的消费潜力，但提高农民收入质量是发掘农民消费潜力的根本。最后，面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现状，本研究将探讨农民收入质量通过消费及投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深层关联，以期解决在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农民收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这一问题。综上所述，本研究对农民收入质量及其对消费及投资关联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明晰农民收入质量提升在消费及投资于农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于保持我国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文献综述及评价

（一）农民收入研究文献综述

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西方已有文献很少有对“农民”这个群体进行收入方面的研究，因为该群体的构成十分复杂：既包括拥有土地但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土地所有者，以地租为主要收入；也包括拥有土地同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场主，以经营利润为主要收入；亦包括没有土地的农业雇工，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由于该群体的收入来源和生产性质各不相同，因此难以一同研究。西方文献中提到的农民

(farmer) 是指农场主，而有关农民收入的研究也指的是农场主的收入研究。

由于西方与中国学术界关于农民收入的研究主体不同，因此当研究影响收入的因素时，其研究方向与国内研究差异较大。西方学者较为关注土地自身情况，如土地购置价格、资源禀赋和供求关系等，这些均会影响地租的定价。Mathijs 和 Noev (2004) 的研究证明，耕地面积是农场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除了耕地之外，机械和畜力的投入对促进农场收入的提高同样具有显著作用。Iddo Kan、Ayal Kimhi 和 Zvi Lerman (2006) 通过对格鲁吉亚农业发展现状的研究，同样得到了耕地面积与耕地质量等对农场收入具有积极作用的结论。土地的要素投入同样备受关注，因为要素成本与利润息息相关。Balint 和 Wobst (2006) 通过研究认为，土地、资本以及劳动力的投入对农场收入均有极重要的正向作用。此外，农产品价格是西方学术界研究农民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因为农产品价格直接关系农场主的收入。西方经济学常常把有关农产品价格问题的讨论视为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讨论。Headey 和 Fan (2008)，Gilbert (2010) 等分析了农产品价格水平的影响因素。Meyer 和 Cramon-Taubadel (2004)，Frey 和 Manera (2007) 研究了粮食价格的传导机制。Dawe (2008)，Ivanic 和 Martin (2008) 分别对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还有很多研究从农产品供应链、供求关系、空间价格均衡等方面出发，使用高级的计量模型得到了一系列成果。除以上因素之外，政府政策作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同样是西方学者关注的话题。其中，Barro (1981) 对主要有效的政府政策，如税收、利率和补贴等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结合各自国家农业的特点，政府所采取的扶持政策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取得了明显成效。Brian Briggeman 和 Wilson (2007) 研究了政府的农业补贴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政府通过增加补贴可以显著提高农场收入。政府补贴不但降低了农民“脱农”的可能性，而且平均每个农户可增加 4000—5000 美元的收入。

近十年来，西方学者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新的思考。Lerman (2004) 通过研究认为，农民进行规模经营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农场进行规模经营可增加农产品销售量，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农民收入。Iddo Kan, Ayal Kimhi 和 Zvi Lerman (2006) 的研究发现，农民受教育程度与其非农收入呈正相关。经历高中教育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为负，弹性为 -0.35；但接受过高等学历教育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弹性达到了 0.97。然而，教育虽然会对农民的非农收入产生正向影响，却对农业收入产生了负向影响。

由于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独特性，西方学者对我国农民收入的研究热情日益高涨。Gregory Veeck 和 Clifton Pannell (2015) 对江苏省四个地区进行了入户调查，他们通过分析调研数据认为，农民收入结构与城市距离关系密切：苏州等城市附近的农民主要收入来源为非农收入，偏远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收入。John Giles 等 (2003) 对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过程中的信息重要性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制度性障碍是我国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Johnson (2002) 通过研究我国国情后认为，在小城镇发展企业的方式，其成本比农民向大城市流动所需要低。Li 和 Steven Zahniser (2002) 则认为我国的农村人口进行转移的目的之一是在未来获取更多的资本。

在西方经济学的已有文献中，统一用来解释、分析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经济理论框架并不存在，仅有发展经济学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如何演化的角度，提出了农民增收需要经历的必然阶段。刘易斯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实质上是工业部门的发展过程。工业部门的发展必然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工业部门将依靠高报酬吸引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当剩余劳动力全部转变为工人时，发展中国家就已经跨入了发达国家行列。20世纪 60 年代初，拉尼斯和费景汉对“二元经济理论”中工业部门的报酬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两位学者发现，工业部门的报酬实际上与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在